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 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审视

## ——北京大学中日关系史研讨会纪要

牛大勇

1996年12月11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和美国华人学术团体日本侵华研究学会联合在京举行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是对日本侵华战争进行历史再审视。

与会学者有: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李锐、白介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张海鹏、张振鹂、杨天石、李玉贞、杨奎松、曾景忠、汪朝光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罗焕章、刘庭华、高培等,国防大学何理,军事医学科学院郭成周,北京师范大学王桧林、金再及、蔡德金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琦、任贵祥、李向前、林小光等,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研究所李郁,北京市档案馆刘苏,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杨学军,法国科学研究中心巴斯蒂(M. Bastid),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李淑珊(Susan L.),美国华人学者吴天威、唐德刚、朱永德等,北京大学荣天琳、张寄谦、丁则勤、沈仁安、杨立文、宋成有、李玉、牛大勇、欧阳哲生、王元周等和部分博士、硕士研究生。

与会者就以下几个问题进行了专题发言和讨论。

### 日本侵华史有待深入研究的一些问题

我国学术界对日本侵华史的研究,起步较晚。八十年代中期,因日本发生教科书事件,才引起我们的重视。当前,力量仍很薄弱,任务日益突出。日本侵华史研究一要拓宽领域,二要加强专题研究。三要加强对海外研究成果的译介和评论,积极开展海内外学术交流。四要抓好学术成果向社会效益的转化,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作用。

会上回顾了关于日本侵华史的历届国际研讨会和中美有关学术杂志出版的情况。1997年是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六十周年,中美学者将合作出版

中英文资料集,以大量的现场证言详细揭示当时日军的暴行。

丁则勤在专题发言中提出,百团大战是华北日军对中共力量认识和战略的转折点。1940年8月以前,是华北中共力量大发展的时期,日军则以消灭或迫降国民政府为主要目标,在华北同时攻击国共军队。百团大战使日本统治集团和日军感到中共力量的真正威胁,总结教训,全方位地调整了在华北的政策和战略。白介夫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证实百团大战以后,日军加强了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他并指出,日军战略上的变化是从正面战场抽调兵力,投入我敌后战场。尤其是1942年的华北大扫荡,最为惨烈。当时白老正处于日军合围的中心,左权副参谋长就在附近牺牲。突围时,彭老总身边仅有一个班保护,罗瑞卿身边只跟着几个挑夫,情况均很危险。新华分社这样的非战斗单位,包括社长在内即有47人牺牲。

杨天石指出,我们以往对日本侵华的政治谋略研究不够,其特务工作尤应注意研究。仅在1938年6月,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就制订过一套严密的特务工作计划。其中,“鸟工作”包括:“鸠工作”(建立伪维新政权)、“鹰工作”(策动反蒋运动)、“鹭工作”(离间蒋政权的将领和政客)、“鸮工作”(蒋政权内部的反共谋和工作)等;“兽工作”包括:“狐工作”(对宋哲元)、“鼠工作”(对韩复榘旧部)、“狗工作”(对东北军)、“狸工作”(对阎锡山)、“猫工作”(对石友三)、“牛工作”(对徐源泉军队)、“鹿工作”(对刘建绪军队)等;“山工作”包括对李宗仁、白崇禧集团的利用等等。巴斯蒂谈到,欧美学者在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时,对谍报史的研究也取得很重要的成果。

郭成周详细报告了他长期对日本侵华细菌战罪行的调查研究。张寄谦谈了中国高等科学技术教育在抗日战争时期艰苦卓绝的发展。李玉贞、朱永德讨论了苏联、斯大林对中国抗日战争复杂的态度。与会者认为,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李淑珊提出了中国需要让自己的抗日战争研究成果走向世界的问题。她谈到:在美国,实际上没有多少人知道中国的抗日战争,大家主要了解的是欧洲战场的情况。当年的新闻媒介也很少报道中国战场,美国民众至今对中国抗战史不甚了了,甚至不知道台湾是日本侵占去的,被日本占领到1945年为止。这种情况造成美国朝野上下都不大了解中日关系的历史和中国大陆与台湾关系的复杂性、敏感性,从而对其有关决策有所影响。她还指出了中国抗战史研究失于偏颇的地方。例如:美国很多空军人员曾为援助中国人民抗日而参战执勤,其中不少人血洒长空,骨抛青山。但因种种因素的干扰,美国有关

人士差不多五十年后才等到了中国方面正式表示的感谢,他们为此已经差不多等了一辈子。这一天的到来,尽管太晚了一点,他们仍然感动万分。而同那些已经逝去了的援助中国抗战的美国老战士相比,他们毕竟还算幸运。李淑珊的外祖父林迈克(Michael Lindsay)曾经为中国人民特别是晋察冀根据地的抗日战争作出过宝贵贡献。她的这番话值得人们深思。

还有学者提出抗战史研究中的民族因素问题。当年日本是以整个中华民族为侵略征服的对象,不是只打一党一派。我们对抗日战争的研究,要着眼于加强民族凝聚力,加强海内外华人、尤其是海峡两岸的合作。

沈仁安认为,我国的抗日战争史研究者往往不够了解日本的历史和国情,今后应更多地从日本史角度来研究中日关系。另一方面,有些研究者又往往接受日本右翼学者的一些观点,加以宣传,以为很新鲜,这是很危险的。

有些资深学者指出:近年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抓主要矛盾不够有力。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中,中日矛盾是主要矛盾之一。可是学术界有一阵子为了密切配合眼前的外交需要,大写近现代的中日友好关系史。要记住:1894年至1945年间中日关系的主流是日本侵华,给中华民族造成无穷的灾难,影响深远。

### 对日本的战争罪责的认识与斗争

近来日本朝野某些势力对侵略战争那段历史的态度,引起亚太地区国际社会和人民的广泛关注。其国内为军国主义辩护和翻案的逆流,从右翼社团与政界人士之间的唱和响应,有向学术界和教育界蔓延的趋势。与会者一致认为: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罪责不断加以历史审视,深入研究和清算,教育子孙后代,端正国际视听,是中国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曾景忠指出,日本右翼势力一再制造翻侵略铁案的事端,并挑起钓鱼岛事件。最近自民党外交调查会作出决议,敦促外务省尽快实现让来访的外国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厚生省准备在东京建立一个“和平祈念馆”,专门纪念在对外侵略战争中送命的亡魂。在东京成立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声称,反对现行教科书把日本全部近现代史定性为犯罪的历史,要另编一本“能很有自信地”向青年一代传授所谓“历史知识”的教科书。以奥野诚亮为会长的“光明日本”国会议员联盟,不久前决定设立一个名为“教科书协议会”的组织,其宗旨也是要纠正所谓“自虐性”的国家观和历史认识。日本侵华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了研究日本侵华史,我们要重视调查史实,抢救活史料,对日本侵略者造成的破坏、伤亡、财产损失等等,都要查清,档案部门要大

力支持。

李锐结合亲身见闻,谈到日本当年大力推行军国主义教育,日本兵舰横行中国内河,日本侨民在东单迎接日军开入北平的种种情形。他认为,目前日本基本上是从上到下地对侵略战争采取掩饰、回避的态度。我们应该全面透彻地研究日本政治、经济、军事的历史和现状。这关系到二十一世纪国际关系的走向,关系到究竟应该怎样对付日本。白介夫认为,现在和未来,国际间都存在政治、外交斗争,而且确实存在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威胁。我们同日本在对于侵华战争历史的认识上,至少要斗争五十年。对青年一代要加强教育,让他们了解我们研究的成果和史实。

吴天威指出,日本侵略军在南京一地即屠杀30多万中国人,强奸8万中国妇女,给中国财产造成天文数字的损害。我们有责任清算这个账,对祖先、对子孙都要有个交代。日本方面应该明白,这是法律问题,道义问题,人性问题。

与会者还提到,欧洲反法西斯国家战后树立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纪念建筑,教育人民不要淡忘历史。日本也在全国各地设有各种战争纪念点,向世人展示自己是战争受害者。我们却至今还没有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纪念馆,这是值得重视和反省的问题。

关于爱国主义教育,宋成有认为,只停留在讲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暴行的层面上是不够的,还应该很好地反省近代中国一再战败的原因。具体原因可能有:国家经济力量对比悬殊,国民素质方面存在问题,对日研究和情报工作做得很差。仅就情报差距而言,日本对我国情况研究得很细致,情报质量高。我们必须认清差距,发愤图强。发扬爱国主义的关键,要把我国建设强大起来。光有义愤是不够的,自我反省也很重要。国家勿以小忿乱大计,个人勿以小利忘大义。

日本朝野某些势力对侵略战争历史教训不能深刻反省的原因

日本为什么不能正确对待侵略历史,认真吸取历史教训?与会学者从多种角度对这个怪现象进行了研讨。

有学者认为,近代日本对外侵略得势的时间较长,败亡的时间却很迅速,这使得日本一些人在感情上难以承认现实,也不能正视败亡的原因。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发动或参与的侵略战争有14次,平均第5—10年一次,前后断断续续有六十余年在战争中度过。日本近代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部侵略史、战争史、血腥发财史。也有学者列举日本发战争财的统计数字,认

为某些日本当政者似乎从中悟出一条“侵略—发财—再侵略—再发财”的邪道。近代历史上日本的大发展总是同战争分不开的，战胜了，固然发财，即使战败了，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也削减乃至取消了日本的赔偿。二战后德国赔偿 560 亿美元，日本仅对亚洲一些国家付出 18 亿美元的赔偿。这是对世界正义的亵渎，对亚洲十亿受害人民的侮辱。随后发生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都使日本大发战争横财。日本某些当政者似乎又悟出：战争总归对日本有利，战败也能获利。

有学者总结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原因为：(1) 战败时坚持有条件的投降，保留了天皇制，成为战后日本重建右倾保守政治体制的基础和复活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2) 战后美国对日本实行单独占领，包庇战犯，保留了祸根。(3) 日本受美国冷战政策之赐，战争责任未获彻底追究，赔款一再减免，经济发展迅速，国力军力已在亚洲称强。一旦走向军事大国之路，亚洲将面临一场灾难。也有学者不赞成把军国主义复活的原因都归咎于美国。他们认为，日本走向侵略扩张道路的根本原因在于自身那套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之中，美国等外在因素对日本走向战争与否，不起决定作用。

何理认为，日本对侵略战争史的恶劣态度背后，是军国主义的历史观在作祟，对此必须予以批判和清算。这种历史观的要害，是否认和抹煞日本发动对外战争的侵略性质。今天在日本持此历史观的人，不是少数，军国主义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根源。以天皇为中心的日本神道，是军国主义历史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思想根源。在神道思想的支配下，天皇即神，全民效忠，很容易走向军国主义。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亚洲主义，种族优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等等，都是军国主义的思想根源。军国主义历史观的核心，是日本对亚洲邻国的优越地位观，其他较重要的观点还包括侵略战争是“自存自卫”论，“生命线”和“利益线”论，侵华战争“偶发”论，等等。

日本总感到自己的实力同国际地位不平衡，它不仅是经济大国，而且要当政治大国、甚至军事大国。吴天威等认为，日本要先就过去的侵略战争罪行郑重道歉，彻底赔偿，深刻反省，取得亚太国际社会的谅解，才能获得相应的国际待遇。目前国际社会对于日本变为政治大国乃至军事大国的企图，应予以高度警惕和制约。

唐德刚在总结发言中，举出近代中国著名的外交家们盱衡大局，纵横捭阖，举重若轻，以弱制强的成功范例，说明外交的艺术在于擅以四两迫千斤，而不宜以千斤迫四两。

这次会议开得紧凑而热烈，一批在抗日战争史研究领域取得瞩目成就的海内外著名学者聚集一堂，交流了最新的前沿进展情况，提出了许多有待探索的问题。学者们来自五湖四海，所持观点也代表着五湖四海。不同观点之间进行了交流甚至交锋，对学术研究的发展是大有益处的。学者们希望今后再有机会来进一步讨论和探索。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 美国旧金山召开“中日关系研讨会”

徐 勇

1996年12月6日至8日在美国旧金山史坦福大学召开了“中日关系研讨会”，笔者应邀与会，现将有关情况介绍如下。

该次会议由华人社团“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主持召开。参加会议人数近200人，分别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澳门、韩国、马来西亚及欧洲等国家地区。其中华人及华裔学者专家占半数以上。中国大陆学者出席会议共6人。

6日上午9时会议揭幕，首先举行追悼二战受难者仪式。在悲愤哀痛的“松花江上”二胡伴奏曲声中，著名华人电视节目主持人杨华莎女士朗诵悼念诗歌，随即由大会主席、香港慕江英文书院院长杜学魁致开幕词。当天上午在大会发言的有：台湾实业界和文化界著名人士郭俊铄先生、美国默士达大学谭汝谦教授、美国纽约罗切斯特理工大学朱永德教授。相继在大会上发言的，共有32人。会议讨论涉及最多的问题主要有：

关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历史及现状。郭俊铄认为：战前日本军国主义有三大支柱，即天皇制、神国思想与财阀，这三根支柱在战后都有潜伏下来的势力，并以不同形式复苏，正在对东亚与世界和平造成威胁。天津学者周启乾认为：日本军国主义还在蠢蠢欲动，世界人民必须提高警惕；日本正确认识历史，是发展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

关于中日钓鱼岛争端的历史与现状，是与会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谭汝谦认为：有充分的历史资料证明，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而日本帝国扩张时期的